

## “雲霞收夕暉”：葉明勳先生追思紀念會 走過一世紀：懷念我們的父親

葉文心\*

自有人類以來，大約沒有一個人沒有父親。這也就是說自有人類以來，喪父是人人不可免的經歷。但是當這個發生過億萬回的事情到了眼前今朝，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父親的身後事當作平常事來看待。

沒有兩個父親是可以相互取代的。每個父親在兒女的生命之中都有無可取代的地位。每一對親子，一路走來，都有獨一無二的故事與相互特別的牽記。

與父親在這個世界上共處，我們兄弟姐妹們不能不說是非常幸運的。許多人與他們的父親所得到的時間十分短促。許多人因為種種原因，不能與他們的父親共同處在一個屋簷之下。中國人作父親，也並不是自古以來便是一團和氣的。我們的父親給了我們將近六十年的時光。我們從父親那兒所體會到的，並不是父權的獨斷，而是父愛的深摯。

我們兄弟姐妹們有時候會爭辯父親的最愛到底是誰。父親對兒子是有幾分批判精神的，對女兒們則呵護有加。我在臺大做學生的時候，父親在世新辦完事，便常在下午時間在新生南路學校的

側門外，等我出來，一路回家；我所參加的第一回舞會，地點是我們家的客廳，舞伴是父親所指定的他的好朋友耿伯伯的三位公子，老父親晚上十點鐘親自光降，會場立刻燈火通明，舞會也立刻結束。

妹妹政大畢業以後，考上《中央日報》擔任記者，奉命跑立法院。她對立法委員們十分害怕，父親不好親自幫妹妹去當小記者，於是下令做哥哥的文立和做姐姐的我輪流負起給《中央日報》記者壯膽的責任。

過去多年來，每逢我們姐妹們從國外回來，父親總是謝絕晚宴，親自上街張羅大沙公，取出最寶貝的西洋紅酒，把在華航上班的小妹召集回家，這時連素來反對他喝酒的母親也願意小酌一杯。弟弟說爸爸偏愛女兒，我說爸爸最愛的還是兒子！這輩子他對我所做過的最高正面評價，便是「可惜你不是個男孩子」！當然，父親自己一再聲明，他對我們四個人一律平等看待，每個都一樣的愛。

就像所有的人一樣，我們的身分與認同衍生自我們的父親。我們因為他的緣故，而有我們的姓氏、祖籍、傳承與家

\*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.

風。我們的祖籍是福建浦城，浦城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？我們這幫出生在臺灣的兒女們，全靠父親的講述，來認識那個不曾到過的故鄉。據說我們的老家位居仙霞關附近的武夷山山腳下，地形秀美、方言複雜，盛產極大的磨菇、極甜的白菜，還有極多的土匪。祖父、祖母我們也都從來不曾見過，然而每逢除夕與清明，父親總是指揮我們端整儀容向他們行禮，於是我們有了宗法與傳承。

祖宗之外，父親常說他沒有什麼可以留給我們的資產。他對於可以累積、也可以被人拿走的資產沒有什麼信心，他常說，他給我們的是讀書的機會和做人的榜樣。父親相信知識，他說只有憑自己的努力取得的知識是別人拿不走的。他也相信名聲，他說為人處世，公道自在人心，無論善名或惡名，一個人這一輩子只有名聲是永遠逃不掉的。

父親是戀舊的。他有一抽屜的新毛衣，但是他經常在家穿的總是一、兩件上頭有小洞的毛背心；但是這個戀舊的人，在少年時代又一腳跨出了武夷山下的故鄉，據說我們的祖母因此哭出了好幾缸的眼淚。不過，要不是有他那個時候毅然跨出去的一腳，今天也就沒有站在各位面前的我們。

中國的20世紀是動盪的世紀。父親生在民國2年，與他同時代的人物，每個人都得憑靠自己的見地，重新評估傳統中國在現代實踐中的意義，給自己走出一條祖宗們沒有走過的路。我們的父親在三十歲之前便完成了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三級跳，從閩西山地的財主之家跨進省會福州的高等教育圈，再走進陪都重慶全國新聞的大本營。

浦城與福州都是福建。但是浦城風氣保守。福州是通商口岸，早已經求變求新。父親在福州求學，老師包括嚴琥教授，也就是清末思想家嚴復先生的第三個兒子——後來成為我們的外祖父。父親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精通英語的浦城人。但是他的英語在浦城沒有用武之地。他在福州出人頭地，意思就是以後也就回不了浦城的家。

從福建到重慶，父親從協和大學的訓導長變成中央社總社的編譯。40年代的中央社直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，抗戰時期可以說是全國人文薈萃的所在。父親在這個環境裡，既沒有名牌大學新聞系的科班訓練，也不是黨校的嫡系出身。他所熟悉的福州，比起別人的北京、上海或南京，也算不了什麼大城市。父親在中央社，顯然算不上什麼人物。然而他對這個時期的中央

社非常懷念，把它當作一個大學校；對這個時候的長官同事們非常佩服，欽仰他們的學養與風範。當時的他，把全副的精力投注在編譯與新聞工作上。

那時的父親，看起來有幾分削瘦，每天在上班的路上，都要經過當時中宣部梁部長的家。每回看見風乾在陽臺上的一隻隻雞與鴨，都不由地有點兒羨慕；走在路上如果遇見一頭活的豬，他也會因為想到紅燒肉的美味而高興地發笑。然而他精神抖擻，因為重慶這個世界大戰的中樞之一匯集了各路人馬，有共產黨、有各種黨外人士，也有許多盟邦顧問、外交使節和外國通訊社，所謂「八方風雨會中州」，讓他這個來自福建的人大開眼界，體會到中國之大，以及與世界連接的密切。

戰爭的時代是槍桿子當道的時代，我們的有點饑餓的父親卻始終相信筆桿子的力量。他相信多元的輿論，與多方觀點的報導；他也相信在中央的制高點之外，地方上的民情與民意有他們主體的重要性。新聞界的名言，是報紙只有一天的生命，世界上沒有隔夜的新聞。父親作為新聞人，自然得學會搶快、搶先、搶獨家，然而他同時更相信，要在非常的時刻作出色的報導，那麼平常就得靜下心來，做一點平實的耕耘；他也

相信成功的報導是有歷史生命的報導。如果要發這樣的稿子，就得累積些知識、培養點眼光，在事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，多多研究其中相關的人物與問題。

父親作為第一線的新聞人，求快、求先之際，講究某種氣度與判斷。重慶中央社顯然引發了父親對工作的熱情，他對報導對象有著極強的理解願望，他對如何作出負責任並有深度的報導不斷地進行反思。他善於側耳傾聽、也樂於側耳傾聽；他對自己，凡事成功不必在我，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。只要能夠得到些真知灼見、能夠見證到大時代，於公於私，他都十分快樂。就是有時候有人欺負他，也就算了，很有孔孟的忠恕以及鄉下人的樸實精神。

抗戰結束，父親奉總社蕭社長之命，赤手空拳來到臺灣，開辦中央社臺北分社的業務。他見證「二二八事件」以及中央政府遷臺，我們家的牆上，有一個時期曾經掛著蔣總裁親筆題贈給「夏風同志」的一幅半身戎裝側面照片。以後父親親歷或者目睹了許多臺灣近代史，包括國民黨的清黨與改造，韓戰、越戰對大局勢的影響，大陸政策的轉變與辯論，臺灣的經濟轉型，國民黨政權的在地化，與民主選舉的普及化。他在這個期間默默地耕耘，領域包括新

聞教育、廣告企業以及多元媒體。

父親原本大約仍盼望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陸。他有幾分《楚辭》情操，想像流放與異鄉。但是政權嬗變、江山流轉，年復一年，我們這些沒有見過浦城或福州的人們，因為父親這六十多年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所結的無數緣法，早已把這個唯一無二的土壤看作我們的故鄉，父親自己在來臺一甲子之後，也明白宣布他是「無辭甘為臺灣人」。

每個人都有父親、都有傳承。有些傳承是來自基因的。比如說，父親操作機械的本事十分平凡，他跟母親約會的時候自己橫衝直撞地駕駛著一輛福特轎車，幸而那個時代的臺北市一共數不上多少輛私家車，所以沒有出車禍；然而後來我們兄弟姐妹四個考大學，沒有一個人的數學是及格的，恐怕不得不拜父親的基因之所賜，又比如母親有極好的歌喉，父親則除了國歌尚可勉強之外，其他曲調五音不全，荒腔走板，我們幾個沒有人學得成聲樂，也都怪他。

然而我們傳承自父親的無疑是20世紀中國跨越1949年的全盤歷史脈絡，以及國民政府遷臺之後的一甲子經歷。六十餘年是一段不短的時間。早年父親以儀式與故事來建構我們想像之中的父祖與故鄉，他自己作了爺爺以後，變成

了我們下一代認同與傳承的源頭。他作爺爺，永遠記得每個人的生日，不忘每個人特別的喜好，經常悄悄地提供些口袋裡的零用錢，常常問下一次什麼時候再見。他參加過我們的各種畢業典禮，他也參加過我們下一代的各種畢業典禮。他主持過我們幾個人的婚禮，他也答應過向向：「你結婚，爺爺一定來。」他不愛多話。他緊緊地抓著孫子的手。

因為父親的緣故，我們的下一代承繼了他少年時代的浦城，也因為他的緣故，我們的下一代對於宗法籍貫之類的分類選擇十分灑脫。有了這樣的爺爺，做人的意思就是走自己的路、盡自己的心，好好地以本來面目平實做人，在每天的點點滴滴裡尊重機會與緣法，珍惜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。

父親早年有成，中年困頓、心情鬱悶的時候「酒逢知己千杯少」，朋友們笑他，說他像馬車變南瓜、美人變灰姑娘，每夜每到某個時刻，就由「明公」變成「勳公」，再醺醺然變成「公臺」，由朋友們一起把他扶回家。

勳公在人生道路上，年紀大了一些以後又變回明公，每天黎明即起，各處灑掃，默默耕耘。國家與未來曾經是他少年時代的關懷與抱負，家庭與兒女

是他壯年時期的責任與負擔，晚年他放下了那些擔子，每天循著一貫的作息，透過點點滴滴的平凡事，「行時行，止時止」。他的周遭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，他的作風簡單，他的目光深邃，他達到人生爐火純青的境界。

父親在他的朋輩之中是後死者。近年來他的摯友們紛紛謝世，「訪舊半為鬼」，然而他始終不曾退休也不肯退休，彷彿只有如此，方能為他的一批肝膽相照的朋友們善盡到後死者的責任。

今天我們兄弟姐妹送別我們的老父親，我們慶幸是他的子女，我們以依依不捨的心情，為他的人生劃上句號。老天未必給他發上一手好牌，但是蒼天待他也不為不厚。父親所教導我們的，是人的命運在自己的手裡。

許多人忌諱談死，但是如果沒有死就沒有生；葉公超先生為父親所畫的蘭花有榮有枯，沒有枯就沒有榮。死與生是親子之間最親密的互動。父親在病中的時候，有一天我挽著母親的手臂，走向他的加護病房，想當年我們一一光降這個世界，是他守在母親的身邊，恭候我們跨進這個世界的；將近六十年之後，我們一一扶著母親向他道別，惜別他的離去。

父親平常不多談生死。但是他病後，我收拾他的書桌，知道他雅好蘇軾，近年來尤其常常玩索東坡和子由灑池懷舊的詩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哪復計東西。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。往日崎嶇還記否，路長人困蹇驢嘶。」

父親對僧家、俗家的各種寶塔、紀念碑的永恒意義並不寄予厚望。他也不認為人們的記憶能夠永遠保持常新。在禪與道的領悟中，他找到了安頓身心的場所。

我們遵從父親的意思。我們不把他放在供桌上。我們永遠把他點點滴滴地放在我們的心裡。